

# 上 编

## 史诗说唱艺术论

被誉为具有‘永久魅力’的古希腊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是欧洲文学宝库中的明珠，也是世界文化的珍品。后世的许多作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可以说，他们的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这两部史诗的影响。史诗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创造了如此完美的史诗的人是谁呢？传说是一位古希腊的盲艺人荷马，他大约生活于公元前 9—8 世纪。正是这位闻名世界的荷马，将小亚细亚一带民间口头流传的史诗短歌综合加工整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两部史诗巨著。此后，史诗又回到民间以口头形式继续传播，至公元前 8—7 世纪才被用文字记录下来。又过了一个多世纪，这部作品作为传世的最后形式，才被人们用文字固定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荷马史诗。尽管古希腊社会及文化发展的记载极其贫乏，但我们从上面粗线条的叙述中，不难看出这两部巨著的产生、发展及最后形成，经历了至少三个多世纪的漫长时间。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对荷马是否真有其人的问题仍有争议，却不影响我们作出如下的结论：即这两部史诗体现着众多艺人的劳动结晶，饱蕴着多少代人的心血。从中不难看到，在荷马以前，众多的民间歌手的游吟传唱为史诗的产生奠定了丰富的基础；而在荷马以后，直到固定成文以前，仍有广大的口头艺人为保存和传播荷马编就的史诗付出了努力，自然也应包括那些书面文学记录者的辛勤劳动。在史诗没有成为一个固定的文本之前，谁又能保证他们在保存、传唱、记录史诗之中，未将个人的感情色彩以及才华融汇其中呢？谁又能否认这如此众多的无名艺人对希腊史诗的杰出贡献呢？然而，遗憾的是，时光流逝，他们都被无情的历史尘埃所淹没。至今人们只知道一个荷马。其实把荷马看做是创作这两部史诗的众多民间艺人的总称似乎更为妥当。

这一历史的遗憾是我们做为后人所追悔莫及和无法弥补的，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今天，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举世瞩目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仍在民间流传，保存、传播史诗的众多口头艺人、书写艺人依然活跃在民间。我们的史诗正在经历着、重复着希腊史诗所走过的那段历程，即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以至最后成为史诗的定本这样一个过渡阶段。我们亲眼看到了众多的民间艺人是如何珍视他们世代相传的史诗，并为此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我们亲耳听到了那激荡在雪山草原的深为群众所喜爱的史诗旋律。比起那些荷马史诗的研究者来说，中国史诗《格萨尔》<sup>①</sup>的研究证者是幸运儿，我们无需为荷马的生卒年代去进行艰难的考证，更无需为荷马史诗的流传方式、说唱形式而百思不解，因为说唱《格萨尔》的‘荷马’至今还活在中国。

如果说‘荷马的艺术才能是座熔炉，通过它，民间故事、诗歌和诗的片断的粗矿石炼成了纯金’（别林斯基语）的话，那么，中国众多的藏、蒙古、土等民族的艺人则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熔炉群，通过它们冶炼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民族文化的真金，同时，他们又构成了一个人类文化的珍宝库。

然而，长时间来，我们主要注重于艺人说唱记录本，或依据记录稿整理后出版的文本的研究，其中又主要是文学角度的研究。这固然是重要的，却又是远远不够的。史诗是人类多元文化的载体，文学角度的研究难以概括它的全部科学内涵，因此，即使是文本的研究仍需拓展视野，运用多种学科的手段和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方能贴近史诗科学的客观实际。更是长期以

<sup>①</sup>为简便起见，根据约定俗成，称藏族该史诗为《格萨尔》，称蒙古族该史诗为《格斯尔》。

来，我们或囿于文学学科的限制，或由于其他种种原因，几乎没有注意到中国境内诸如藏族、蒙古族、土族等几个民族中，至今仍活跃于民间的史诗说唱艺人。这大约百余位艺人的存在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称之为国之瑰宝是毫不为过的。当国外的史诗研究者、文化人类学家足迹遍全球而“遍寻无着”时，我们国内竟让这宗宝藏又沉睡了数十载，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有感于此，笔者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有意识地走访了藏族、蒙古族和土族的史诗说唱艺人，所得颇丰。应该说，在对于艺人价值的认识方面，直到八十年代末人们才取得基本共识。尽管仍有差距，却不失为一个可喜的进步。这里所说的共识是指对说唱艺人本身所具有的科学价值的认识而言，即指对艺人的专门研究。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虽然蹉跎了几十年，许多优秀艺人已经辞世，但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优秀艺人健在，正所谓“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在旧西藏，说唱艺人也曾引起了个别酷爱《格萨尔》的达官贵人们的注意。他们从最为直观的认识出发，知道要想得到最精彩、最生动的史诗唱段，就离不开好的民间说唱艺人。虽然他们当时并未认识到艺人的重要价值，更谈不上研究什么。但是他们却采取把艺人请到家中或寺庙里，记录他们说唱的章部的做法。在藏族艺人中，阿达尔曾为拉萨达吉岭贵族家派到那曲来的两位秘书说唱了《霍岭之战》后由他们记录成文带回拉萨，才让旺堆曾在上安多的伯恩寺说唱《卡契玉宗》，由喇嘛们记录成为抄本，献给夏河的拉卜楞寺院；抄本世家布特·杂的外祖父嘎鲁，曾记录过不少艺人的说唱，并抄成工整的本子在民间广为流传。由青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出版的《霍岭大战》(上)明确地记载了该本是由安多地区著名学者才旦夏茸·阿旺央丹如白东觉等人根据颇罗鼎·索朗多杰时期的二十多位《格萨尔》说唱艺人的说

唱记录 并参考了五种不同的抄本 经过整理、校订后形成的。这些都说明了民间艺人的说唱，在历史上曾引起个别有识之士的注意，并对他们的说唱进行了记录、整理和抄写等工作。

国外《格萨尔》研究学者在搜集抄本、刻本的同时 也注意到了民间艺人的说唱，并做了记录工作。虽然大多是一些史诗的片断，但是对于后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当然，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他们记录的史诗被石泰安(R·A·Stein)教授称之为“半口传”其理由是 在记录史诗时 由于没有现代化的录音手段，只能让艺人慢慢背诵才能记下来，这样势必会使讲述人迟疑犹豫，以至说唱的内容、语言与自然状态下的说唱有所不同。尽管如此，这些本世纪初的史诗口头记录，仍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它们是以下六种文学的记录本。

#### 一、来自西藏的说唱记录本

- 1、弗兰克(A·H·Francke)传教士在拉达克记录的本子；
- 2、罗列赫(G·Roerich)用拼音记录的安多说唱的片断；
- 3、达维·尼尔(David-Neel Alexandra)记录的康方言本；

#### 二、来自蒙古文的记录本

- 1、波塔宁(Potanin)记录的布利亚特阿拜《格斯尔》片断；
- 2、汗嘎洛夫(Xangalov)记录于巴拉巴斯克地区的说唱片断；
- 3、卡亭(Curtin)在布利亚特伊尔库茨克以北地区记录的《格斯尔》

(以上蒙文本大部分是由俄国精通蒙古文的学者记录、翻译的。)

### 三、来自青海互助土族地区的蒙呼尔记录本

由德国多米尼克·施罗德传教士于1948年至1949年在互助记录了土族艺人贡布的说唱。

### 四、来自锡金北部山谷的雷普文本 (Lepcha)

- 1、由毕渥德·斯托克 C·Beauvoird stocks 记录了一个老妇人边跳边唱的本子，内容为征服妖魔；
- 2、由哈尔顿·辛格 Halfdan siiger 记录了《霍尔》的一章；

### 五、来自吉尔吉特的布鲁萨斯基语口传本

由骆里莫 D L R Lorimer 冲校在吉尔吉特洪扎地区搜集，用科学的方法记录，将全文注上音，逐字翻译，部分专用名词在索引中作了解释，包括序言、诞生、与珠牡结婚、称王、征服哈哈国、与霍尔的战争等章节；在1989年成都《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巴尔蒂斯坦人阿巴斯·加兹米介绍了他记录的格萨尔的故事，是由生活在巴尔蒂斯坦的位欣族 (shin) 故事家阿卜杜尔·拉赫曼·默斯德里巴说唱的。

### 六、土尔其语记录本

流传在南西伯利亚的口述本，由瑞德洛夫 (Radloff) 记录、注音后，译成德文于1866年出版。

在以上说唱记录本中，摩拉维亚传教士弗兰克是最早忠实记录并翻译藏文口述《格萨尔》的先驱者。“本世纪初，传教士弗兰克先生在拉达克地区，成功地记录下来两篇他发现的流传在那里的格萨尔故事。他将原文、德文译文及注释于1900年发表在《芬兰—乌戈兰社会札记》上。”<sup>①</sup>后来，他又在下拉达克从一

① 参见英文本《格萨尔传奇的个下拉达克版本》序，1941年加尔各达

个 16 岁的姑娘那里记录了一部《格萨尔》这一口述本的藏文原文、英文概要以及注释被题名为《格萨尔传奇的一个下拉达克版本》于 1905—1909 年由孟加拉皇家亚洲协会在加尔各答出版，共印刷了四次，弗兰克本想将所有搜集到的口述本及索引等汇总出版 未能如愿。他于 1933 年离开了人世。受弗兰克的委托，加尔各答大学教授 S. K. 查特基把所有的记录本及弗兰克发表的六篇文章汇集在一起译成英文，并为此书做序，于 1941 年由孟加拉皇家亚洲协会正式再版。弗兰克虽未见到自己的全部成果的汇集出版，但这一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版本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财富。它包括预言、天神遣子下凡、诞生、格萨尔的青年时代、结婚登位、娶汉公主、降服北魔、降服霍尔等章节。

达维·尼尔女士与永登活佛合作，根据康区说唱艺人的说唱记录，同时参照她所搜集到的手抄本，整理出了《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于 1931 年用法文在巴黎出版。该书 1933 年又由窝勒特·舒德尼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1959 年再版，1978 年、1981 年又分别在美国纽约和科罗拉多州再版。这一版本虽是整编本，但在西方影响较大。为她说唱的艺人是青海玉树地区结古镇的艺人德钦辛巴，据传他是霍尔国大将辛巴的化身（霍尔被降后，辛巴归顺格萨尔 成为他的忠实将领之一），此人喝醉酒后 即举刀奔出屋外，要杀一个据说是霍尔白帐王转世的在结古寺当小喇嘛的十岁的男孩。就是这位艺人为达维·尼尔女士说唱了六个星期，由她和她的朋友记录。这位艺人具有神秘色彩，他不仅声称曾得到过格萨尔大王的谒见，还经常失踪不知去向。此外，他又是一个巫师、占卜者，他声称可以和格萨尔大王互通信息，并可预见人世间的未来。这个本子是用散文体写的，包括了预言、天界、诞生、赛马称王、降服北魔、霍尔、姜国、门国、大食之战、分大食财宝、安定三界、格萨尔返回天界等主要章部。第一次

以一个较完整的故事，把《格萨尔》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对于《格萨尔》的走向世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极为可惜的是它很少保留史诗最精彩的部分——韵文部分，使人们难以从语言上了解它的韵味和特色。

法国艾尔费女士曾撰写了《藏族格萨尔王传的歌曲》专著，为研究史诗的曲调，她曾经记录了八位艺人的说唱，他们是囊谦人仁钦达杰、苏茹克人贡布扎西、霍尔人强巴桑达、德格人丹增陈列、当雄人罗桑单增、康巴人扎西顿珠和尼迈，以及尼泊尔北部牧民阿克嘎玛。其中仁钦达杰曾为希腊王子皮埃尔录过说唱，罗桑单增为法国石泰安录过《赛马称王》。

迄今为止 在国外学者中 对于史诗《格萨尔》及其说唱艺人研究最精深者当数法国石泰安教授。他曾出版过《岭地格萨尔王传》（1956，德文版）。他的力著《藏族格萨尔王传与演唱艺人研究》（1959，巴黎）仍是目前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之一。该书共646页。他旁征博引，立足于藏文资料，从历史文献、民族文物、民族情况等不同方面，探讨了这部史诗构成的各种因素。

首先，他认为在对故事进行剖析之前，必须先将史诗的起源、产生时期、发展经过以及英雄人物的性质及故事的来源等问题都考证清楚，否则光靠对史诗本身的研究是无从弄清问题的。为此，在这些方面他花费了大部分精力。石泰安论证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即是，他认为与人们称之为希腊—佛教艺术东移的设想一样，格萨尔史诗也存在同一趋势，那就是罗马的凯撒大帝或东罗马帝国称为凯撒尔的人，在西藏的史诗中变成了他们的英雄人物。由于这支文化的流动穿过中亚，在伊朗和阿富汗接受了印度和东罗马帝国两支文化，流向远东。这支文化也将各地的艺术带到了西藏高原。这中间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又通过大量的中间媒介，使各地各民族各时期的文化内容相互混杂、交流融

合在一起。他的这一史诗外来说的观点曾影响了不少后来的学者。

此外，他通过大量的例证来说明史诗说唱艺人与萨满（巫师）的关系，尤其是他对于说唱艺人帽子、禅杖的形状及功能的叙述极为详尽，为我们了解说唱艺人的过去形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当然，由于石泰安教授研究时所能见到的版本的局限，尤其是他所直接采访的说唱艺人为数很少，所以他曾断言：目前没有一本书，也没有一种民间口传的故事包括了本史诗的全部内容。当时他认为史诗的主要情况包括了天界、诞生、赛马、北魔、霍岭、姜岭、门岭、大食等十几部而实际上流传在中国藏区的《格萨尔》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如果说当时没有一部分章本的《格萨尔》可以包容如此广泛的内容，倒是事实。然而目前能够完整地说唱几十部甚至上百部《格萨尔》的民间艺人却大有人在。

为此，对于说唱艺人的专题研究，把艺人放在更辽阔的社会背景之中的研究，以及艺人的分类研究，解释其神授说的奥秘等等，都将成为可能。因为我们的研究是建立在掌握数十位优秀艺人的资料的基础上的研究，是对至今仍活跃于民间的众多说唱艺人的研究。我们并不比前人高明，我们只能庆幸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赋予了如此的良机，使我们得以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在这条崎岖的路上继续前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今天，中国各族说唱艺人的地位与价值得到了应有的承认，从而为抢救口头的活的史诗奠定了有利的基础。尤其八十年代是中国抢救《格萨尔》说唱艺人的最佳时期，大量的采访及录音工作（目前已经录制了近5000盒磁带）为我们深入地研究史诗的产生、流传、发展及变异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素材。

我们相信，确信民间说唱艺人的价值，并对他们进行专题研究 必定会为“格萨尔学”开拓一个更加丰富多采、更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领域，必定会进一步促进各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兴旺。

## 第 一 章

### 艺人的地位与贡献

1991年11月20日，初冬的北京已是北风习习，然而人民大会堂里却洋溢着春天般的温暖。在这里，24位卓有才华的藏族、蒙古族《格萨尔》民间说唱艺人被命名为《格萨尔》说唱家”。这桩在中国民间文化史上的创举，必将在国际史诗研究界作为佳话而传诵。

1987年11月3日，北京百余位藏学专家和学者曾隆重举行，为卓越的藏族《格萨尔》说唱艺人扎巴举行了逝世周年纪念会。这位享年81岁的艺人与其他藏族、蒙古族艺人一道，曾于1986年应邀来到北京，做为先进个人的代表，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这些来自青藏高原和内蒙古草原的地地道道的“平民百姓”，何以得到如此规格的表彰和荣誉呢？还是让我们从著名的藏族老艺人扎巴说起吧！

#### 1.1 国之瑰宝

1979春天，退休的养路工人，74岁的扎巴从林芝到拉萨来

看病；仲堪 རྒྱུང་མཁའ་ལྷན་ 藏语意为故事家 这里指《格萨尔》艺人 扎巴来了”的消息在拉萨城里不胫而走，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一时间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年纪大一点的人对于仲堪扎巴是不陌生的。在旧社会 逢年过节 扎巴曾不止一次来到拉萨 为人们说唱藏族人民喜爱的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他在群众聚集的地方说唱，到老百姓家中说唱，也曾去过有钱的贵族家中说唱，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老人走过了一条极为坎坷的人生道路，既有不堪回首的苦难的过去，又有激动人心的幸福的晚年；既有神秘的令人迷惑的“神授”故事来源 又有忠心耿耿脚踏实地的为抢救《格萨尔》所做出的斐然成绩。

扎巴于 1906 年，即藏历第十五绕迥火马年出生在西藏边坝县一个贫苦农奴家庭。9 岁时曾迷失在外 7 天，人们在离他家不远的一块大石头的背后发现他时，他已昏睡多日。醒来后，嘴中便不停地说着《格萨尔》的故事。扎巴说这些故事是在睡梦中得到的。从此 他开始了说唱生涯。由于家庭生活贫困 以及繁重的乌拉差役 扎巴不得不背井离乡 以说唱《格萨尔》行乞来养家糊口。他从边坝县经波密，流浪到工布地区，后又到山南、日喀则、拉萨一带游吟度日。与此同时，他朝拜了藏区的神山圣湖，膜拜了古刹名寺中的先佛神祖。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在浪迹高原、吟唱史诗《格萨尔》中度过的。艰难而坎坷的生活磨砺了他坚忍不拔的性格和对说唱艺术的挚着的追求，高原的壮丽山河陶冶了他乐观豁达的情操和艺人才华，这一切使他的说唱技艺日臻成熟，最终成为一位远近闻名的仲堪。

1979 年西藏大学派人把他接到拉萨，从此，开始了他说唱史诗的录音工作。扎巴可以完整地说唱史诗《格萨尔》34 部。短

短的 6 年中，共说唱了 26 部，总计录制了 998 盘磁带（60 分钟一盘）若按已经出版的 3 部<sup>①</sup>的平均数字，即每部 5000 诗行计算 那么 26 部可达 13 万诗行之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如此长篇巨制竟是出自一个目不识丁的民间艺人之口，实为举世罕见。扎巴说唱的《格萨尔》不仅篇幅长、含量大，同时故事情节生动曲折，语言丰富流畅，曲调富于变化，堪称当代《格萨尔》艺人中的佼佼者。

如今，有的人写出了一本书，或许只是几篇较有影响的作品问世，即可堂而皇之地被称为作家。相比之下，对于这些“不识字的作家”的评价则去之甚远。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判他们的功绩呢？我想授予他们“说唱家”的称号，给予他们应得的荣誉和礼遇，无疑是正确的，他们当之无愧。

在中国藏族、蒙古族以及土族生活的地区，能够说唱长篇史诗《格萨尔》的绝不仅仅是扎巴一个人。他们宛若灿烂的群星，遍布于这些民族世代生息的草原平川、高山雪原。在旧中国，他们大部分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游吟生活，然而却矢志不移地为承继和发展史诗说唱而默默地奉献着，以他们充满激情的说唱温暖饱经世间沧桑的人们。人们从他们的说唱中汲取力量和慰藉。

处于现代文明氛围中的人们，也许难于了解这部史诗及说唱艺人在各族群众心目中的人地位。藏族、蒙古族、土族人民几乎把格萨尔王奉若神明，对其充满无限崇拜和敬仰之情。为此，艺人们在说唱之前要煨桑，要用酒祭祀英灵。这些仪式除包含有对格萨尔的尊崇外，笔者认为它更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人们深

<sup>①</sup> 这三部是《门岭之战》，1980 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松巴犏牛宗》、《仙界占卜九藏》，民族出版社 1982 年、1984 年出版。

信，格萨尔确实曾生活在他脚下的土地上，民族的繁衍生息延续及今天人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在当年格萨尔大王东征西伐所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在，格萨尔虽然已不在人世，但他和他的众英雄的灵魂仍活在世间，与民族同在。

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人民创作了史诗《格萨尔王传》并在长期的传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它是千百年来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虽然我们对于史诗产生的准确年代还无法确定，这部史诗最早的雏型以及它所依据的历史原型也尚未得到考证，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承认的，那就是经过了无数代艺人的口头传承，以及经过了跨越民族和地域的传播，这部史诗目前所达到的规模是惊人的，举世无双的。尽管这其中已经分不清哪些是哪一位艺人的创造和发展，哪些是某一地区的独特说段，但是说唱艺人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容置疑的。

毫无疑问，那些未曾留下姓名的众多的民间说唱艺人，在传唱史诗的过程中，将他们的阅历、他们对史诗的理解、他们所能使用的最好的语汇、民间最喜爱的曲调等，天衣无缝地融入史诗之中，不断给史诗注入新鲜血液，使史诗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正如高尔基所说：“英雄史诗是一个民族全体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种集体思维的完整性，使它具有至今仍然不可超越的、思想与形式完全和谐的高度的美。”<sup>①</sup>目前，在中国，史诗仍在发展，年轻的艺人时有发现，新的说唱部本仍在增加。

迄今我们已经搜集到手抄本、木刻本、除异文本，约有近百部，依据藏族艺人说唱部的统计共有 120 部，若按每部平均 5000 诗行计算，其总数达到 60 万诗行，这是号称世界最长史诗《摩诃婆罗多》（10 万余颂，一颂 2 行，约合 20 余万行）所无法相

引自高尔基《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比的。

《格萨尔王传》反映了藏民族从分散、原始的氏族社会逐渐向统一的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在表现这一重大历史变革的史诗《格萨尔》中藏族古代社会的历史、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当时人们的道德规范、审美情趣、民俗民风 and 语言文学等均得到了极好的反映，堪称一部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百科全书，是“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的“一种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是具有“永久价值的全民族的经典”。<sup>①</sup>

这样一部民族的宝贵经典，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正是主要依靠民间艺人的记忆，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保存和传播的。因此，史诗《格萨尔王传》以及继承和传播它的众多的民间说唱艺人，都是中华民族及其伟大祖国的瑰宝，是祖先留给后代的伟大遗产、无价之宝。

## 2 史诗《格萨尔》现象

今天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已经被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中国无史诗”说（黑格尔语）得以彻底纠正。藏族、蒙古族《格萨尔》已经跃上了国际学术论坛，引起各国藏学、蒙古学家的广泛重视。特别是 1983 年以来抢救史诗《格萨尔》的工作连续被列入国家“六五”、“七五”的重点项目，抢救、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格萨尔》的多种文艺改编形式，诸如歌舞剧、京剧、藏戏、电视剧等相继问世，令国人耳目一新，对这部英雄史诗有了更深的了解。它的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承认。格萨尔学作为藏学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版。

中的一个热点，已经在格萨尔的故乡——中国形成。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一部劳动人民创作的史诗得到如此的重视和赞誉，只有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才能成为可能。

目前，如果说人们对于史诗的价值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的话，对于参与创作并直接传承了这部史诗的民间说唱艺人的历史功绩和作用的认识和评价却远远不够。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如下两点：1. 轻视民间作品及其创造者的传统观念的存在。虽然人们承认民间艺人对史诗的贡献和创造，但是，若将他们与作家相提并论，又总觉得难于接受，似乎仍然有个“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分野。当然这一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后，已有较大的改观。近年来，有关部门对于《格萨尔》说唱艺人已给予了重视，只是限于财力和物力等原因而未能尽如人意。2. 艺人研究尚属开创阶段。对于说唱艺人所表现出的许多独特的、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的事象尚有待于作出科学的解释，从而也影响了对于他们所具有的真正价值的认识。世界上绝大部分有史诗传世的国家，诸如希腊、芬兰、印度等已无说唱艺人可寻，仅有各种史诗如《伊利亚特》、《卡勒瓦拉》、《罗摩衍那》等的定本传世，因此国外基本上没有史诗艺人研究的成果可资借鉴。而在国内尚未引起广泛的注意。加之说唱艺人多居边远地区，或山村，或高原牧场，交通十分不便，寻访艰难。而艺人研究的跨学科性又凭增难度，既非文学角度的文本研究所能独为，亦非人类学角度的心理或人体研究所能全部涵盖。如是涉足此领域者寥寥。上述种种，也影响了对于艺人们所具有的全部价值的科学认识。

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存在与流传，做为一个民族的古老的文化事象的遗存，一种原始的民间口头说唱形式，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它呢？如何科学地解释史诗说唱艺人各具的特质、评说他们的价值和贡献？此乃史诗《格萨尔》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

问题。它不仅是我们抢救史诗工作中急待解决的一个认识问题，同时也是文学和文化人类学史上一个有待开拓、探索并得出科学结论的问题。

对于其他民族的读者认识史诗《格萨尔》，往往通过文字——书本、图像——舞台、影视等媒介了解到它是一部散韵结合的文学作品（蒙古《格斯尔》则基本上是全韵体）或者是一个颂扬一位英雄业绩的故事，仅此而已。但是对于这部史诗流传地区的藏族、蒙古族人民来说，《格萨尔》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个重要的文化事象。

关于文化的概念，各国学者提出了数百种定义，各有其见仁见智之处。这里只引用一百余年前颇具权威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sup>①</sup>泰勒认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是学而知之的，是共同享有的，这两点是领悟人类在社会上所作所为的性质的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因素。这就是说，一种文化现象，首先它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共同创造的，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其次，它是在同一社会或社区中，生活在一起的群体所共同拥有并共同受益的。每种文化现象，它产生于社会，均有其合理性及历史的必然性。藏族《格萨尔王传》产生并得以流传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是如此。学术界一般认为它产生于 11 世纪以后的数百年间。

回顾藏民族的这段历史，安定统一的盛世不多见，多的却是分裂割据、连绵的战乱。即使是吐蕃王朝时期，其政界内部的斗

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原始文化》转引自《文化的研究》载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的《文化与个人》一书。